

凉山彝族企业家

——社会和制度变迁的承载者

〔德国〕托马斯·海贝勒 等著

〔中国〕于长江 译



民族出版社

凉山彝族企业家

——社会和制度变迁的承载者

[德国] 托马斯·海贝勒 等著

[中国] 于长江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凉山彝族企业家 / (德) 海贝勒著; 于长江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10

ISBN 7-105-07078-1

I. 凉... II. ①海...②于... III. 彝族—企业家—人物研究—凉山彝族自治州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175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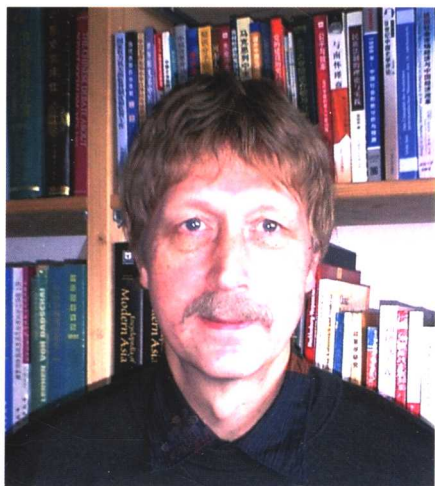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9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2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 1947年出生于德国奥芬巴赫,曾在法兰克福、哥廷根、美因茨和海德堡大学(1967—1972)学习社会人类学、政治学和中国研究,1977年在不来梅大学获博士学位,1992—1998年任特里尔大学政治学教授,1998年以来受聘任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曾担任德中友协主席,现为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东亚学研究所副所长、德国亚洲学会理事。同时兼任澳大利亚《中国地区》和《欧洲东亚研究杂志》等刊物的编辑以及其他多个研究机构、基金会的理事和顾问。已出版著作25部、主编10部、发表论文75篇。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变迁,其中国研究主要以中国境内的实地调研为基础。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LIANGSHAN YIZU QIYEJIA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 任：马 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江	马 戎	王铭铭	刘世定
刘 能	李建新	朱晓阳	邱泽奇
赵旭东	赵 斌	高丙中	郭志刚
钱民辉	麻国庆	蔡 华	潘乃谷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于 1985 年和 1987 年相继建立的，多年来始终在他直接的学术指导下进行教学、科研以及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的工作。费孝通教授一贯倡导认识中国社会必须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从科学的调查研究入手。他自己身体力行，无论在选定命题、提出破题思路、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和学风等方面都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之路。

遵循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和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重大问题，积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过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们努力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全国人民都为在 21 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现象需要我们去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同时因学科一度中断，有许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需要我们不断进行补充与积累，继往开来，今后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园地将越来越宽广，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责任也将越来越沉重。任重而道远，只有奋发努力，再接再厉，才能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适应中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并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学习和发扬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踏踏实实的学风，也为了交流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汇集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以来的部分成果，编辑成《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出版，1996年至2004年共出版30余卷。今后这一系列的丛书，将主要包括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调查报告、区域发展研究、专题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从事具体工作部门的人员，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还编辑出版了《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和《社会学人类学译丛》两套系列丛书，主要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从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方法、重要专题研究等方面介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此外，社会学界的一些同仁还与华夏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我们希望，以上这几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促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逐步创立扎根于中国土壤、具有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同时又能够真正走向世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2005年3月

序

马 戎

在西欧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政治建构以各种形式传播和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之前，亚非拉等地已经生存着许多不同的人类群体，这些群体在本地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群体划分体系、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他们在互动中也形成了本地区群体关系的整体框架，各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本地的整体框架和社会体系中都有着比较稳定的制度性安排。在东亚大陆的例子，就是费孝通教授总结出来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样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群体关系的体系，是在几千年社会经济发展和群体互动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在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和政治建构通过和平传教和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武力殖民侵略进入到其他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原有的政治结构和群体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并被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重新整合。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发展较慢、人口较少的群体就在西方军队的攻击和奴役下消亡了（如南美的印加帝国和北美印第安部落），有些原来的多族群帝国（如奥斯曼帝国）分解为多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有些原来并立的多个群体被殖民政权统一在直接的行政管辖之下，并在殖民者退出后在原殖民地的行政管辖范围内组建了新的国家（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有些原来的多族群帝国经受住了外来势力的冲击，基本上保存了原来的领土和人口，但是不得不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民众的要求而在许多

方面进行重大调整（如中国），在这些调整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民族—国家”政体形式下调整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为了与新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际交往相适应，每个多族群国家必须加强全体国民（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群成员）的国家公民意识，努力把“国家公民”塑造成每个国民心目中最重要政治认同，对全体国民进行政治整合，从而维持国家的统一，避免因族群、宗教和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可能出现的国家分裂。同时，国家政权必须促进全国各地区之间的行政整合，当年秦始皇推行的废诸侯、设郡县、统一货币、统一官职、“书同文、车同轨”等各项措施，是中国古代实行区域间行政整合的范例。与此同时，国家还必须对具有不同文化宗教传统的各族群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化整合”，推动一种本国各族群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发掘与宣传本国各族群共有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联系，在关注各族群之间文化差异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他们之间历史上即存在的“共享文化”，使各族群的政治整合、行政整合具有“共同文化”的基础。由于历史上各族群居住地区的发展可能是不平衡的，处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可能低于国家的核心地区，推动这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达到比较均衡的水平，是多族群国家进行“经济整合”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个具有古老文明但是在近代被动接受外来“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多年族群大国来说，在政治认同、行政体制、文化传统、经济发展这四个方面的整合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补课”。只要这些必要的“补课”工作没有完成，国家分裂的前景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始终悬挂在人们的头上。

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要区别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发展”。这是9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根据中国民族人口地理分布的特点首先提出来的。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他们大多居住

在城镇并从事非农产业，有时当地产值的增长可能主要是由这些从事非农产业的汉族职工创造的，实际上从事农牧业的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并没有明显受益。所以需要深入和系统地调查当地各族就业人员在各产业中的分布，关注在制造业、服务业就业劳动力中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调查在政府公务员、法官、律师、教师、工程师、技术工人队伍中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分析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当地少数民族真正参与到各产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

二是要在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需要调查和分析少数民族企业家的成长。美国学者在分析美国的“族群分层”时，十分关注黑人开办的银行在全美银行中的比例，关注在全美排名前100名的公司企业中，由黑人担任董事长的公司占总数的比例。如果各族群的受教育水平相近，在就业和发展机会上没有受到歧视，那么各族群产生的企业家的比例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应当大致相等。当然，由于历史上各个族群在行业、职业的选择上具有不同的传统，有些族群（如犹太人）经商的比例可能高于其他群体。这些都是需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系统分析的。

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我国沿海地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在投资等各方面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倾斜。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整合并通过经济整合进一步推动政治与文化整合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西部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也必然会迸发出新的活力。但是，在西部每一个具体的地区，中央的各项政策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当地干部、民众和企业家是否及时抓住了这一大好的发展契机，真正使当地的经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地的少数民族企业家群体是否真正成长了起来，这些都是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后才能够回答的。

凉山民族研究所的彝族学者们关注到了这些问题，并在与德国

学者的合作中共同开启了关于“凉山彝族企业家”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2004年当我从托马斯·海贝勒教授（他喜欢人们称呼他的中文名字王海）那里得知这一课题时，我是十分兴奋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学者们对当地社会的发展情况十分了解，王海教授则是长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著名专家，相信他们合作研究的成果一定会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凉山彝族企业家的成长状况提供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解答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在我们的交谈中，王海教授表示希望由他和凉山彝族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能够用中文出版，希望纳入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并请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那时我的同事于长江教授恰好正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王海教授就请于长江教授承担了他书稿的翻译工作。原来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工作的王铁志，过去曾经和我一起组织了我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课题，他那时调任民族出版社的总编辑，表示愿意出版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经过了大家一年多的努力，这本书最后终于可以送到出版社排印了。除了王海教授本人的书稿之外，本书还收入了分别由4位彝族学者撰写的论文，这4篇论文各有特色，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凉山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历史、彝族传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彝族传统的经济观念、彝族特有的“家支”组织的经济功能，提供了许多作者亲身观察的社会现象并进行了归纳分析。我相信，参加这一合作课题的实地调查和成果撰写工作将会推动凉山民族研究所今后的研究工作。

王海教授的书稿“凉山彝族企业家”是这本书的主体，他和合作的彝族学者们一起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10个县里访问了138位民营企业家的，并采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问题涉及到当地社会、经济、政策、民族关系的方方面面，具体而深入，这些实地调查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表格和数据。当

然，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我们可能会提出不少质疑：这些调查方法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调查时提出的具体问题是否符合当地民众的思维习惯，这些被访者在彝族企业家中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在使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推论时所使用的西方理论和观点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国情，是否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诸如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很多。但是，即使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如果他是去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区做调查，这些问题也是同样存在的。在学术观点上，我们需要一个彼此宽容和平等讨论的学术环境。王海教授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娶了一位中国太太，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比较了解和友好，出版过专门讨论中国民族问题的英文著作，也先后主持过多所德国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工作，在欧洲汉学界很有影响。他这次积极与中国少数民族学者合作，和他们一起到基层去从事实地调查研究，共同发表研究成果，我想这是应当鼓励的。

我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外国学者与中国的学者合作开展研究，通过他们的笔向西方国家的读者们客观地介绍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的发展新貌，在介绍中国的特点时也发现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共同之处。我觉得这些外国学者在新世纪的跨文化对话中可以成为文化沟通的桥梁，扮演十分积极的角色。不同的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带来沟通中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出现矛盾，但不是会必然导致美国学者亨廷顿所预言的那样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国人从历史上就主张“和而不同”，赞成文化的多样性和兼容并包，这种东方的智慧造就了一个延续数千年历史和拥有 13 亿人口的文明大国，我相信具有这样悠久历史的人类智慧也会为未来世界上可能发生的文明冲突提供化解的思路。

2005 年 6 月 25 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致 谢

没有许多个人和机构的帮助，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实现的。德国的大众汽车基金会（Volkswagen Foundation）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研究经费，资助了中国西昌的凉山民族研究所和德国 Duisburg - Essen 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共同开展这一合作研究项目。

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与我共同开展这一项目的来自凉山民族研究所的彝族合作者，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使这一研究项目得以推进。他们向我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得益于他们的丰富经验，我才得以理解凉山社会结构和发展进程的许多方面。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研究所的所长罗聪、副所长马尔子及研究员巴且日火、呷呷尔日。我同样十分感谢李进教授和董红情教授的支持，这两位凉山农业学院的汉族学者也参加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我衷心地感谢布拖、甘洛、金阳、美姑、冕宁、普格、盐源和昭觉县党委和政府对这一研究项目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课题无法如此顺利地实施。我也十分感谢许多当地官员和企业家对这一项目的顺利开展所给予的大量帮助。

我特别要向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马戎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并把这本书编入他们研究所主编的《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系列。我还要感谢该研究所的于长江教授，

致 谢

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把我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他使我的书稿呈现出目前的出色形式，而且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以使书稿更加完善。

最后，我要感谢民族出版社和王铁志先生在出版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托马斯·海贝勒

2004年9月于杜伊斯堡

Acknowledgements

This book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many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A generous grant made by the German Volkswagen Foundation provided the funding for this joint project of Liangshan Minzu Yanjiusuo in Xichang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Duisburg – Essen in Germany.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the Yi colleagues from the partner institute in Xichang who with undoubted commitment did their utmost to enab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on the ground. They also provided a lot of advice and without their enormous knowledge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understand many of the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in Liangshan. Therefore I am very grateful to Luohong Zige (Luo Cong),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and his deputy Mgebbu Lunzy (Ma Erzi) as well as the Senior Research Fellows Bajie Rihuo and Gaga Erri. I am also grateful to the support of Prof. Li Jin and Prof. Dong Hongqing, two Han scholars from Liangshan Agricultural College who participated in our research. Wang Bin from Meigu county also contributed notably to the success of our research. My sincere gratitude as well to the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ies of Butuo, Ganluo, Jinyang, Meigu, Mianning, Puge, Yanyuan and Zhaojue, without whose support this research project

Acknowledgements

could not have been so successfully managed. I am very grateful, too, to the large number of officials and entrepreneurs who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facilitate the success of this research.

Particular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Professor Ma Rong,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for all his efforts and support, his advice and the possibility to publish this book in the series of his institute. Further thanks go to Professor Yu Changjiang from the same institute who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translate the text, to bring the manuscript into a splendid form and who made valuable comm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nuscript.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inzu Chubanshe and its editor – in – chief Mr. Wang Tiezhi for publishing this book in their publishing house.

Thomas Heberer
Duisburg, September 2004